

中共建政以来“扫黄”背后的玄机

近期,广东警方对东莞大规模打击卖淫嫖娼,这条新闻一时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打击卖淫嫖娼作为一个信号和标志,在中共建政、改革开放初期和1989年这些关键的时间点和时间段上发起,也彰显了中共对中国社会改造、构建、管理和控制上的决心和努力。

一、建国初社会改造 建设新社会卖淫嫖娼被严格禁绝



经过改造的上海妓女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刚进入北平的中共政权并未马上明令取缔妓院,但已决定决不能让妓院发展和维持下去。在当时的北平,因社会情况复杂,妓院已经成为国民党特务、兵痞、盗匪隐匿其中对抗中共打击的避风港。

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公安部门专

门制作了“嫖客查讞”章,对于去妓院的嫖客,一经查到,就盖在嫖客的身份证件和货单上,甚至有益在嫖客身穿的衣服上。

1949年11月21日夜,北京市的妓院悉数被查封,延续数百年的“八大胡同”灰飞烟灭。

对于从业妓女,政府为她们开设文化课,同时让她们参加劳动,以利于她们改掉好吃懒做的恶习。至1950年6月底,被收容的1000多名妓女全部走出教养院。

此后,全国各地展开关闭妓院的社会改造浪潮,至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

中共在建国初对卖淫嫖娼的禁绝性打击,是中共建国后进行社会改造活动的一部分。卖淫是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其最大特征是两性关系商品化。而中共建政后的努力,是建设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物质资料、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计划指令进行。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尽管人们物质文化生产水平低下,但卖淫现象也没有生存土壤。

二、改革开放后严打 社会转型期卖

淫嫖娼再次成为打击重点

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

1980年前后,一批歌舞厅、娱乐休闲场所色情服务开始逐渐增多,卖淫嫖娼现象正在蔓延。

80年代初的治安乱象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的重视,1983年严打也由此展开。从公安部门查处的数字来看,1982年查处11500人,1984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281人次,到1989年突破10万,此后逐年上升。

80年代的严打并非空穴来风。社会的“乱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颓废文化趁机而入,封建主义毒素也沉渣泛起,腐蚀人们思想,危害社会主义文化”,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在政治上搞动乱,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卖淫嫖娼作为泛起的“沉渣”,趁机而入的“腐朽文化”,自然也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

中共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的转型期中对卖淫嫖娼的严厉打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面对改革开放新的挑战时,对国家

和社会基层进行管理和防控的努力。

三、1989年特殊时期 卖淫嫖娼成为专项重点打击目标

对于卖淫嫖娼的严厉打击,打击公安机关从1989年开始有了一种新的形势:专项打击。其标志就是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及其后继单位全国“扫黄打非”小组的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扫黄”行动,与“清除‘精神毒品’”、“占领文化阵地”的宗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一些访谈中,“扫黄打非”办这样描述国内外形势:“世界发生了重大转折,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国际形势风云变换”;国内,“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且碰头叠加”。

作为应对这种“国际形势风云变换”、“各种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重要手段,“扫黄”打击卖淫嫖娼的行动无疑是中共在当时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从总体看来,中共建政后曾多次掀起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的行动,作为整顿社会风气的确有明显的效果。

凤凰网历史 2014.2.10 文 / 兰台

毛泽东追悼大会：三千多人昏厥

吊唁毛泽东期间,大会堂内共治疗398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15813人。一万五千多人在吊唁大厅内外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状,体现中国民众对最高领袖去世的悲恸程度和承受不住的精神打击。这么大的治疗量确是事先无法料到的,居然就靠三十多位大夫护士当场处置而圆满解决,在医学治疗史上也属一种特例。

一天晕倒39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按照预案,治丧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很快落实成立。委员会下设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宣传报道组、外事组、卫生保健组等等。

9月10日毛泽东遗体放置到人民大会堂后,北大厅就迎来一批批悲痛欲绝的吊唁人群,哭声震天,不少上岁数的老干部老泪纵横,步伐艰难。9月11、12日以后在吊唁大厅发生的病号人数有上升的趋势,大夫护士每天值班需16个小时以上。

这两天,广大干部群众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慈祥遗容,因极度悲痛而晕倒39人,休克一人,治疗2375人

(见1976年9月12日《卫生保健简报》第四期手写稿)。

广场医疗站

紧接着的工作是18日下午三时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追悼大会的繁杂事宜。在方案中,拟建立医疗救护站34个,西至西单北大街,东至东单北大街,但重点还是放在天安门广场内。医疗救护工作总指挥站设在天安门红西四观礼台下,配备一辆机动车来回巡视应急。

各医疗站只备有一些急救药品及一般常见的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和中暑的中西医药品,再则是两张行军床、折叠床及担架,条件稍好的医院还能带上一部半导体心电图机、一两个氧气袋及保护药品的冰桶。这些就是当年北京所能具备的最好的急救家当。

三千人突然昏厥

追悼大会准时在9月18日下午三时举行,百万人站满了广场,气氛肃穆凝重。在开始播放哀乐、全场默哀肃立后的短短二三十分钟内,不同方队的三千二百多名参加者因“心情万分悲痛”而突然昏厥,先后晕倒虚脱在地,队形大乱,引发现场一片混

乱和紧张。值勤的首都工人民兵和民警来回穿梭,手忙脚乱把病人抬送到医疗点。

追悼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明显的医疗险情,只有两名虚脱者,一般患病21人,主席台下有九名警卫战士因过于劳累晕厥。整个追悼大会过程中,医保方面无一差错,平安度过。9月18日晚卫生保健组发出第九期简报,居然已经有了详实的救治数字,其数据令人惊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共诊治20126人,其中巡诊4449人。主要疾病有虚脱3259人,心血管疾病35人,脑血管病3人,其他一般疾病16829人。”追悼大会之后,只有七人被安排送进医院治疗,其中有中毒性痢疾一人,急腹症一人,疑似脑炎一人,高烧待查一人,心脏病一人,休克二人。

百万群众追悼大会的肃穆场景早已作为历史瞬间被世人铭记,“短时间三千多人集体昏厥”这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小细节,也可作为毛泽东时代最后一个有意义的事例,列入中国当代史的注脚之中。

《南方周末》2014.2.12 文 / 陈徒手

朝战时中苏朝计划攻日本占韩国？

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不久前解密的一份美国绝密文件显示,美国打朝鲜战争不是为了韩国,而是为了保卫日本。

“可以坐视韩国完蛋,但绝对不能失去日本”

这份解密文件由美国国务院公布。文件显示,美国担心,一旦朝鲜人民军击败韩国军队,共产主义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吞噬岛国日本,美国可以坐视韩国完蛋,但绝对不能失去日本。

1970年9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对新闻记者说:“如果你现在回顾往事,就能发现日本在那个年代有多么脆弱。如果整个朝鲜半岛沦陷,在日本国内,有着具有强劲实力且倾向共产主义的日本社会党——尽管当时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有着巨大的依赖性,而且我们也承诺保卫日本——日本仍将有可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轨道,并朝那一轨道(共产主

义)驶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朝鲜战争”。

为了日本,5.5万名美军士兵在战争中阵亡,同样也是为了日本,近3万美军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仍然驻扎在韩国。

中苏朝200万大军进攻日本？

据《日本时报》此前报道,伦敦国家档案馆的文件还显示,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陆军情报官被告知中国、苏联和朝鲜计划进攻日本本土。这份资料称,1950年12月3日前后,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在莫斯科举行了长达5天的秘密会谈,制订出一份进攻日本的详细书面计划。

美军情报官把这份情报递交给了东京的英国军事顾问A·K·费格森准将。费格森准将又把报告发往伦敦的上级部门。当然,情报参谋小组根本没有考虑过中、苏、朝三国是否有能力将大批部队运过大海,进而攻击日本本土。

根据这一情报,日本战役一旦打响,50万苏联军队进攻日本北部,50万朝鲜军队出击日本中部,100万中国军队向日本南部和台湾发起猛攻。届时,进攻日本本土的三国军队还将得到日本共产党青年战斗团的支援。

英国驻日本高级专员阿尔瓦里·加斯科表示,在1950年12月3日前后,毛泽东和金日成不可能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因为当时朝鲜战场正打得如火如荼。美军情报官也怀疑,这是日本共产党通过代理人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日本历史研究学者彼得·洛说道:“斯大林小心翼翼地避免使朝鲜战争升级为全球战争。他认为苏联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准备好打一场全球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日本和台湾将超出苏联、中国和朝鲜的能力范围。”

《环球时报》2014.2.8

林彪专机副驾驶谈“九一三”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我作为专机组未登机的五个人之一,一直在关注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种种说法。2013年,我的回忆录《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总算可以公之于世。

1971年中央第57号文件宣布了林彪乘机叛逃自取灭亡的消息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已经被党章确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突然乘机叛逃成为死叛徒呢?可想而知,机长潘景寅在飞机上,面对林立果强迫改飞国外航线的枪口所面临的心理冲击,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因此他用手中的驾驶杆在极不情愿的转弯中,通过雷达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问号,这就是为什么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后会形成很不正常的大转弯。

根据坠机现场9具尸体所处的位置判断,林彪是与3个机械师在一起的,距离很近,林彪头朝东,3个机械师头朝西呈“品”字形,这里正是林彪的床与沙发的所在舱位。我判断,3个机械师在迫降中还在抱着林彪,有“保护首长”之状。据此分析,3个机械师至死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死。纵观所有的劫机行为,劫机犯绝对不会允许除机长之外的任何机组人员在前驾驶舱。

那位3685号直升机驾驶员陈士印,是我同一个航校毕业的同学,又分配在同一个部队。“九一三”之夜,当被林彪死党周宇驰等3人,以到北戴河执行任务为借口骗到空中之后,两个飞行员被用枪强迫着向西北飞行。面对突发事件,2个飞行员沉着应对,协调配合,利用周宇驰向外观察的机会,把罗盘指针调转180度,并以小坡度、大侧滑的动作掉头返航。当周宇驰等人发现北京市的灯光时,后悔莫及。西郊、沙河两个机场两次降落未果,就朝怀柔山区飞去。在距离地面80米左右时,另一个飞行员陈修文刚要转身,被周宇驰一枪打死了。驾驶员陈士印在紧急情况下操纵直升机,纠正了直升机的尾冲(失速)状态,平稳落地,保存了飞机上的3万美金与大量罪证。此刻,走出客舱的于新野爬到驾驶舱,瞄准陈士印就要开枪,陈士印突然向前下方卧倒,子弹打伤了周宇驰的左手腕,紧贴着飞行员的后背而过,将陈的皮夹克击穿两个洞。

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两个难兄难弟每谈及此事,总是有说不完的感慨。陈士印被审查、关押10年,转业到东北老家的企业,也不敢参加党的活动。他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被开除党籍。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2.15

文 / 康庭梓